

囚魂的苏醒

〔日〕北冈信夫 著

qiu hun de su x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囚魂的苏醒

——日本战犯在中国收容所的六年轨迹

〔日〕北冈信夫 著

包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囚魂的苏醒：日本战犯在中国收容所的六年轨迹 / (日)
北冈信夫著；包容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ISBN 7-02-005257-6

I. 囚… II. ①北… ②包… III. 纪实文学－日本－
现代 IV.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987 号

责任编辑：耿学刚 陈旻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囚魂的苏醒

Qiu Hun De Su Xing

[日] 北冈信夫 著

包容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5257-6

定价 13.00 元

序　　言

从今天起就是二〇〇二年的腊月了。

但是从十一月入冬以来，天气一直暖和，仍是深秋景象。在流经笔者居住的埼玉县西部地区的一级河流“入间川”岸边，四百年树龄的大山毛榉和许多老树撒下的无数落叶，漂在静静流淌的河面上，向下游流去。垂钓人沐浴着初冬和煦的阳光，钓竿上的鱼丝垂在水中，幽闲清静。

来到邻近的天览山，山路上洒满银杏和木兰科辛夷的金黄色落叶，它们与通红的枫叶形成美妙的映衬，让你为之陶醉。已是十一月中旬，盛开着的可爱的白、黄、紫色的小菊花，依然用它们的残葩渲染着即将消逝的秋色，喧闹的鸟鸣从山腰的树林中传来。

人间万象好似没什么变化，依然在轮回、逝去。但是，如果凝目静观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十一年前的海湾战争造成的创伤至今未愈，彻底荒废了的阿富汗在严冬面前仍旧动荡不已。在巴勒斯坦一天也没停止流血和报复，仇恨有增无减。在伊拉克，阴云密布，危机四伏，日甚一日。朝鲜半岛北部一派阴霾，非洲大陆上迫近死亡的饥饿和贫困依然没有休止，而日本社会也充满阴暗和危机。

如今，世界上到处都陈放着死尸，任其腐朽糜烂。在海湾战

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原南斯拉夫的波希米亚内战中使用了贫铀弹，在伊拉克对科威特战争和伊拉克对库尔德族战争中施放了毒气。世界已经不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空前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宗教、艺术来制止战争或者防止战争了。

而且，从上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今日，世界上已经付出了几千万牺牲者，受到如此惨重的血的教训，却还是这副样子，我们对未来还有什么寄托、希望和梦想？我们在渴望立即制止战争和暴乱的同时，自然要为怎样才能找到抚慰每个人心灵的疲惫和创伤的方法而焦急了。

这次，我要以这部作品向世上发出信息的动机，就是要探求以宽容、忍让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一切民族和居民的共生共存。在利害发生冲突，见解、宗教和信条相异时，人们的集团或者国家就会诉诸暴力或者报复，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一分子。

战后，五十万乃至六十万原日本官兵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五年的羁留生活。其中的大约一千名原战犯，又在中国东北的抚顺市和山西省省会太原收容所度过了六年。他们在一九六五年陆续回国以前，在那里是怎样生活的啊。

在那里，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上演了一出旷世未闻的宽容、忍让、人道主义和人性爱的宏伟的活剧。在那里，体现了感化战犯灵魂的全过程，也体现了促进战犯再生的激烈斗争的全过程。我愿竭尽我的全力，把那六年的轨迹描画出来。

我深信，如果现在仍能以抚顺和太原收容所的精神来包容世界，那么，世界上无休止的相互残杀和冤冤相报就会得到制止、得到化解，而且可能防止其再度发生。

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被我们的子孙耻笑为“愚蠢而又无能之辈”。但是，现在如果不改正世界上的过错，恐怕连他们的子孙都难以生存下去。

在我向各位读者诉说这些时，我热切地期望您能感受到我的期盼。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日早，搭乘第一批回国的三百三十五名原日军战犯的遣返船“兴安丸”，从中国天津港起航。那船带着满船高涨的热情，经过三天的航程，于同月五日下午，出现在京都舞鹤湾，平稳地靠岸。

海风吹来大海的芳香，仿佛是唤起人们天真的回忆的摇篮。初夏晴朗的高空，泄下令人目眩的长长的光束，蔚蓝的大海平静而又辽阔，她比平时更明亮、更清澈。白色的浪花在海面上绽放，好像在欣喜地飞舞。

一会儿，船上的原战犯和在码头上等待他们的一千几百人同时发出欢呼，拼命地挥动胳膊。随后，上岸的原战犯和等候的人像风暴一样奔跑、和亲人拥抱，感泣声、哽咽声响成一片。原战犯们终于踏上魂绕梦牵无限思念的故土，实现了还乡的心愿。

下面，我将记述在北京东北方向一千几百公里以外的抚顺市战犯管理所里度过六年岁月的八百七十九名原日军官兵的触及灵魂的生死抉择和发生在那里的性爱的故事。在那世上罕见的管理所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为了详述那些故事，让我们在这里揭开那奇迹的帷幕吧。

一九五〇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收容了八百七十九名原日军战犯。其中四百人是驻扎在中国山东省的原“支那派遣军、

北支那方面军”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的官兵，其余的是关东军领导下的驻扎在河北等地的官兵和伪满洲国官员。管理所占地面积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六千六百平方米。让我先说一说八百七十九人当中由山东省来这里的那四百人的情况吧。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驻扎在山东省从事各种战斗的原五十九师团的各个部队接到东京大本营的电报，命令全军迅速转移，接受当时在奉天（现在的沈阳）的关东军领导。师团长藤田茂立即关闭了济南的师团司令部，命令所有部队官兵到朝鲜咸兴市集结。

七月十五日，包括原一等兵田中贡在内的该师团第四十五大队官兵搭乘的列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到达咸兴。五十九师团所属的八个大队中的其余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大队，也已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集结在咸兴市。他们怀着回归日本的热切希望，度过了“等船”的数日。但是，东京大本营来电传达的命令，一下子打碎了官兵们的梦。那命令是叫他们构筑阵地迎战苏军。

受到挫折而又疲惫到极点的士兵们，又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八月十五日天皇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广播了停战宣言。这对全体官兵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八月下旬，全体官兵被狂涛怒浪一般南下的苏军解除武装，成为俘虏。官兵们的沮丧可想而知了。

自从到达咸兴市，就一直萦绕在田中贡原一等兵头脑中的噩梦终于变为现实了。七月，离开山东时，包括田中所属的第四十五大队在内的第五十九师团已经处在在中国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全面包围之下，中国军队的穷追不舍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恐惧，直到来到咸兴市才放下心来。但是，指挥官并没正式公布

要回日本，而且传来了美军占领冲绳的消息，他们越发不安起来了。

田中等人当了俘虏以后，在咸兴市兴南小学收容一段时间，就被用船押到海参崴。开始时，田中住在代替收容所的货船里，被命令为船脱锈，干了一个来星期。然后到能俯瞰这个军港的山冈上的收容所羁留两周，给修船工打下手，又到海参崴和纳霍德卡之间的城镇阿尔焦姆，在苏昌煤矿推煤车。矿里酷寒，有时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手脚冻僵，疲劳和严寒使他多次濒临死亡，煤矿的冒顶和爆炸等事故使许多原来的战友变成了不归之人。

第二年，田中一天又一天地在森林里采伐林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一直干到四月。一进五月，又接到命令被移送到朝鲜清津港北边的茂山收容所，在那里又被驱使伐木。七月，搭货车返回兴南市，然后走进西伯利亚安格连收容所。自那以后，他的灵魂就被闭锁在黑暗的深渊里了。

和他们在中国山东将近四年的生活相比，在西伯利亚的日子简直就是地狱。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大山里，砍伐可当燃料又能做木材的松树，一连几天都得不到休息。就这样熬过了没有任何梦想、没有任何希望，乃至没有任何喜悦和欢乐的两年光阴。田中感冒过好几次，而且由发高烧转为肺炎，再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一次又一次地濒临死亡。

尽管如此，他仍然活下来，只能说是靠运气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要回归故里的意念支撑着他才活下来的吧。

西伯利亚的隆冬，连日都是低于冰点以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尽管如此，如果不是高烧超过三十八度，惩罚劳动就不许停止。

一九四九年，田中被移送到伯力飞机场附近的乌里扬诺瓦，干些木工、埋设水管或在建筑工地当伙夫等杂役。后来在俄罗斯女人支配下制砖，每天干七八个小时往窑里装砖坯等的简单劳动。

收容所的伙食是每天一个三百克的黑面包、十八克砂糖、一百克鱼或者肉，加上小米或者高粱米粥和汤，田中一直为饥饿和营养不良所困。六十多万人的俘虏都遭到同样的折磨，在惩罚劳动和事故当中死了几万人，自杀的也不少，严寒之中缺少防寒用具，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在收容所里，苏联管理者和职员们接连发出凶恶的命令，苏联政府刻板的宣传政策和出于惩罚主义而执行的惩戒，加剧了俘虏们的精神痛苦，患精神衰弱者不断出现。

冬季里的一天，原一等兵田中完成伐木工作，走上回收容所的林中小路时天色渐黑，他避开监视人员的视线，捡了几块抛在雪地上的像冻土豆似的东西，偷偷揣在怀里。当他回到收容所，把那些东西放在室内的壁炉上烤，想用它充饥时，那些像土豆的东西却发出异臭，扰动了监房里的人，有人一边作呕一边大叫：

“喂，田中，你捡来的是马粪啊！”

人们哄堂大笑，田中却惊呆了。有人在苦笑之余，由于懊悔和委屈而痛哭流涕。

这时，在田中眼前忽然浮现出“皇军”在中国山东战场上虐待中国农民的情景……农民们在饥饿和悲愤之下是怎样痛恨“皇军”士兵的啊。农民们内心的仇恨和那喷火的目光又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

苏联当局在收容所里发起了“积极分子运动”，以促进战犯与当局的积极配合。虽然表面上是号召揭发和声讨在中国时的

战争罪行，而实际上是告发和批判那些不赞同当局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人的政治运动。

人们之间盛传着如果配合这个运动、得到当局的肯定就能早日回归日本，不过，在原官兵当中也出现了“抗战”到底的分子。结果，他们被当作“顽固而又好战的反苏分子”，他们在中国的各种罪行被臆测加谣传地告密到当局，原第五十九师团第一一〇大队中队长田村贞夫就是“抗战到底派”的代表人物。

协助当局揭发“抗战派”的不问其在中国战线上罪行的轻重，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差不多都回到日本，后来也没引渡到中国。在“积极分子运动”当中，因为给当局的调查官贿赂巨额现金而把名字写进归国名簿上的也不在少数。不知内情的“老实人”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送别先回日本的“战友”。

第二年（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对朝鲜半岛北部的轰炸日甚一日，刚刚建立新政权的中国阴云密布。仍然羁留在西伯利亚的战犯从苏联当局得知这一消息而又不明情况，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午后，仍然羁留在西伯利亚的田中贡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苏联当局要把田中等最后羁留的八百七十九名战犯从西伯利亚移送到纳霍德卡，让他们回国，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

然而，装载八百七十九名战犯的货车跑来跑去也没有驶向港口的迹象。有人拼力把铁门拉开一道缝，向外偷看，只有无数的树木和连绵不断的红土山丘飞驰而过，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货车在山谷间行驶。战犯们从纳霍德卡被塞进货车，车里的汗臭和污秽令人作呕，好不容易到站，却是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

原官兵们搭货车的两天半行程结束了。现在，由中国人用

日语对原官兵们一一点名，点名完毕就命令他们换上中国的客车。换乘时中国武装军人在场。原官兵们在客车里得到发放的面包和热茶，立刻松下心来。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火车在星光暗淡的黑夜里静静地溜进绿草如茵的抚顺东站。

车站上弥漫着内战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爆发的紧张气氛。这列运送囚犯的客车一共有几十节车厢。走下客车的原官兵们分乘几十辆卡车，经过洋槐树林阴道直驶抚顺战犯管理所。每一个路口上都有士兵站岗。

二

管理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警卫战士和管理所男女员工们，从正门排到楼门口，在那里迎来了陆续到达的卡车。员工们都很紧张，满脸严肃。身穿颜色稍深的土黄色军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战士们挺胸站立，冷峻严肃的面孔上清澈而又纯真的眼睛闪烁着晶亮的目光。

四十来岁的陈明化所长代表全体员工对排列在操场上的原日本官兵们作了如下讲话：

你们是曾经侵略过我国的军队的官兵和统治过捏造的所谓“满洲国”的官员，你们都是战犯。

收容你们这些战犯的这个管理所的房屋，是侵略我国的日本关东军在战争当中建造的。当时，遭到日本军抓捕的我国抗日救国人士就被关押在这里，受尽残酷的折磨和虐待。应该说历史是充满嘲讽的，你们要认真地想一想，今天你们为什么被收容到这里。

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遵照管理所的法令和规章生活，行动要有纪律，充分利用赋予你们的反省机会。如果有要求和意见可以向配属各监房的班长提出……

原官兵们按照被呼叫的番号，一个一个地分配到各个监房。

原一等兵田中贡的监房是离管理所进门口最近的五号监房。进门口左边的监房是一所一号至五号，都是四人一室。从西伯利亚带来的一切私有物品，经过登记以后存入管理所的物品保管仓库。

田中和另外三个同室刚走进五号监房，耳边就响起了令人胆战心寒的砰砰的关铁门声和咔嚓咔嚓的上铁锁声。过一会儿，从各个地方也传来了同样的声响。毫无疑问，对战犯们来说，那拖着长长的尾音回荡在耳朵里的声响，就是他们将在中国如同身陷囹圄的未决犯那样度过绝望的日子的序曲，像送葬的丧钟一样刺进他们的心。今后，留给他们的只有忏悔过去的时间了。

监房里的起居空间和卧具，都是按两个人对面的格局设置的。在里间放着大小便用的铁桶和纸，还有盛着洗手水的搪瓷盆。田中贡住的四人监属于一所，一共五间，走廊对面是二所的五个监房，一所和二所一共收容了五十名战犯。

管理所有二百多位工作人员。一所的右前方、操场这边是炊事室，有五十来个员工。从正门进来穿过通向操场的走廊，半路向右是陈明化所长和所长助理曹荣翥等人的干部办公室。

通过一所和二所之间的走廊，然后走进操场前边的过廊向左是医务室。那里有主任张文、护士长王玲玲、护理主任黄月梅、黄的年轻助理王玉兰、药房负责人孙克平等三十余人。

沿着医务室右边的走廊排列着七所的十五个监房，收容了一百二十名战犯，都是伪满洲国的官员。从一所和二所当中的走廊向前走，走到尽头是操场，操场左边是礼堂，西边被一堵高墙隔离，墙外能看见有一个院子。

顺着礼堂西边的走廊向前，左边是三所十八个监房，每个监

房里二十来人，收容了三百九十人。对面的四所有十五个监房，每室十六人左右，收容了二百七十九人。三所和四所监房里收容了旧军官中的尉官和下士官，也混杂着下级士兵。从四所监房和操场之间的过廊向反方向走，在办公室的右后方就是五所和六所，两所紧挨着。五所有六个监房，每室六个人，收容了原佐级军官二十四名。六所有八个监房，每室二人，收容了十六名将官。

负责打扫管理所、处理粪便等的员工有三十来人，负责浴室、理发、供暖等等的杂役也有二十多人。军人守卫着管理所，屋顶上架着轻机枪。军人昼夜值勤，负责警卫任务的有五十多人。

和战犯接触最多、担任所内的重要任务的是分派在各所监房的一名班长和医务室的工作人员。

各所设班长一名：一所班长刘史贵、二所班长李毅、三所班长周福德、四所班长何承宜、五所班长方景镐、六所班长高志民、七所班长蔡世明，全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医务室主任张文，也不到四十，护理主任黄月梅不到三十。助手王玉梅更年轻，在许多方面都受到青睐。

田中贡所在的一所五号监房里的战犯，都是原来驻扎在山东的旧五十九师团的下级士兵。在这四名成员当中，田中是四十五大队的、斋藤明夫原兵长是四十三大队的、外崎胜原一等兵是一〇九大队的、山本健一上等兵是一一〇大队的。在监房里自我介绍以后，四个人沉默不语，满脸忧郁，忐忑不安。

休息了一会儿，稍嫌迟了一点儿的第一顿早餐，由炊事员推着平板车送到各监房来了。就在打开房门配餐的一刹那，每个战犯的眼里都露出惊异。难道那早餐不是羁留在西伯利亚五年

以来从未见到过的饭菜么……大米饭、肉炒蔬菜、炖鱼、煮豆儿、菜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战犯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可是，盛在圆形木盆里的那些食物是事实啊。

虽然一所班长刘史贵目光炯炯，却是一位温和的人。他的声音沉稳而又洪亮，每句都拖长着语尾的日语说得十分流利：

“啊——，米饭——，都随便盛……”

管理所的两百多名员工，在战犯到达的两三个月之前就接受了突击式日语训练。虽然熟练程度不同，但是简单的日常对话都会说。田中等人后来才体会到，为了接收战犯，员工们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刘班长的日语更是非比寻常，那是他在旧奉天时期和日本人的儿子亲密交往十二年学来的，这在日后也使战犯们大为惊奇。

下午一点，准时开午饭。一大碗面条，里面有很多肉、菜和汤。战犯们不顾大汗淋漓，连面带汤一点不剩，吃得饱饱的。晚餐又是白米饭，两份河鱼和一份炒素菜。早餐和午餐经常有白面馒头，一周吃一次干炸鲤鱼。

因为战犯们饱食终日而且没有惩罚劳动，和拘押在西伯利亚时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不过，由于饮食习惯不同，油腻在胃里停滞，再加上长期饥饿之后突然摄取大量富有营养的食物，结果一个接一个肠胃出了毛病。各所监房在班长的照护之下，接二连三地去医务所，管理所的医务室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战犯们来说每天下午在操场上做柔软体操和散步，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日课了。

包括田中在内的战犯们在连续不断的、令他们几乎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睛的美食面前，有时也忽然清醒，想起在皇军压迫下的中国农民和城市市民的悲惨景象，不禁对比着自己现在

的生活盘算起来。

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处在朝鲜战争的非常时期，管理所从所长到工人，每天吃的都是高粱米饭或者小米粥和加一点青菜的汤。监房里每天议论得最多的就是饭食。议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管理所如此对待战犯。四所的原尉官、下士官和五所、六所的佐官、将官以及七所的伪满洲国官员的大部分都以为是临刑前的最后晚餐，心中疑虑越来越深，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在一一所到四所的下级士兵和七所的原官员当中，也弥漫着同样的空气。

田中和同监房的山本健一原一等兵投合，他俩也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付战犯的新手段，愁容满面。

战犯们来到管理所以后大约过了两周，八月初的一天，收容在六所监房里的原驻扎在山东的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把六所的高志民班长叫到房前，指着墙上贴的《战犯守则》问道：“房里贴这张纸没有道理，我们怎么是战犯？无论如何我们也是皇军的将军和士兵，而不是犯人啊。你们太无礼啦，把它撕下去！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人啦，不要弄错！”

高班长说你的要求我不能接受，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件事传遍了所有的监房，在西伯利亚曾以反“积极分子运动”斗士而闻名于战犯之中的四所十号监房的原一一〇大队中队长田村贞夫和四所三监房的原四十四大队中队长青柳忠元也纷纷响应。他们反对《战犯守则》上写“战犯”，要求撕掉，并且要求停止以番号称呼战犯而呼叫名字。他们疯狂地顶撞班长何承宜，恶语相加。和青柳同监房的原一〇九大队中队长山本孝助大喊大叫：

“喂，班长，你他妈的过来！你们把我们皇军当什么人啦，小看我们可不行，你这个中国佬！决不许把我们当作罪人！”

何班长冷静而又坚定地说：“请你不要大喊大叫，有意见和